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暗黑森林》中沙漠意象

宋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

摘要 | 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小说《暗黑森林》中的沙漠具有多重内涵，首先它是一个物理隔绝之地，却也成为激发女主妮可摆脱模仿、获取解放的契机。其次，通过解构传统男性叙事中对沙漠的荒芜想象，小说展现了沙漠内在的生命网络与自然主体性，建立起生态与女性的隐喻关联。同时，结合犹太文化的沙漠叙事传统，分析民族救赎叙事与女性个体困境之间的分歧，指出女性通过向内求索实现自我觉醒的路径。沙漠由此成为联结自然与女性的隐喻性意象，也为理解当代女性生存困境与主体性重建开辟了新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 | 妮可·克劳斯；《暗黑森林》；生态女性主义；沙漠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x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在西方文学中，沙漠通常是荒芜与死亡的代名词，在犹太历史中，沙漠经常是一个神圣的启示场所。而在犹太女作家妮可·克劳斯的笔下，沙漠意象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内涵。书中的沙漠是规训之地，又是解放之野。它表面死寂，实则充满生机。它承载着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隐喻着女性的个体生存困境，沙漠转化为一个生态女性主义的复杂符号。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作为美国新生代作家代表，其创作常融合文学性与哲学思辨。长篇小说《暗黑森林》创作于她的艺术成熟期，书中主角妮可步入中年，面临婚姻危机，且新作迟迟未能完成，处于创作瓶颈期。由于一系列机缘巧合，她被困于以色列沙漠。书中独特的沙漠意象涉及女性与生态之间的联系，巧妙地构建了一个生态女性主义的阐释空间。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理论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结，批判西方现代性中“征服自然”的男性中心叙事。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薇尔·普鲁姆

伍德（Val Plumwood，1939—2008）提出了去中心化认知理论，反对将人类视为自然的唯一主体，主张打破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等级制^[1]。强调自然包括动植物、生态系统等具有独立于人类评价的内在价值和自主性，如沙漠中地下水系的自主循环、植物的适应性生存策略等现象皆可印证。同时她也主张认知应从“支配—被支配”模式转向互惠关系模式，解构父权制对自然和女性的客体化机制，号召对自然和女性的关爱，倡导建立新的生态自我及伦理关怀^[2]。

故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理论框架，欲重构沙漠这一传统上被男性叙事主导的文学空间。首先，沙漠被呈现为一个物理隔绝之地，外部环境的荒芜与女主角内在的创作困境和婚姻危机形成共振，同时沙漠规训着女性但是存在着解放的可能。其次，通过细腻的生态观察彻底解构了男性叙事中对沙漠荒芜的单一想象，揭示了其强大的生命网络，赋予自然和女性以独立于人类评价的内在价值与主体性^[3]。最后，沙漠深刻交织着犹太文化中

作者简介：宋平，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美国文学。

文章引用：宋平.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暗黑森林》中沙漠意象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5, 7 (11): 939-945.

<https://doi.org/10.35534/pss.0711159>

的启示传统,以及女性的边缘生存困境,也揭示了民族叙事与女性处境的差异——犹太男性在沙漠漂泊终获神圣救赎承诺,而女性的荒漠困境却需依靠自身觉醒与主动抉择。最终,妮可在沙漠通过反思和觉醒,逐渐找到自身的力量与存在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沙漠从一个看似荒芜之地,转化为女性自我重建的场域,彰显了自然界与女性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总而言之,沙漠作为一个富有多重内涵的空间,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其生命力,也促使我们思考女性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借由内在的力量与觉醒,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主体性。

1 沙漠的生态隐喻

沙漠首先被呈现为一个物理空间上的隔绝之地,构成了小说的叙事背景,是一个通过空间对比、资源缺乏、社会联结断裂,以及视觉感受等多重维度建构出来的地方。

空间维度上,沙漠广阔无垠,在它面前,房子都显得如此渺小,以至于房子的存在本身都显得滑稽可笑。这“房子很小,小得让人想笑,别忘了四面都是沙漠。”^[4]这句话中的“想笑”,充满了苦涩的意味。但这可笑的一方天地,竟是妮可唯一赖以存身的地方,而它之外,便是望不到头的荒漠。生存资源上,最基本的生命之源水也被沙漠同化和侵蚀。“水龙头流出的水呈褐色,就像从管道进来的是沙漠本身,而厨房的水龙头流出的水仅仅是浑浊和苦涩的。”^[4]这里的比喻暗示着水不再是纯洁的,而是“沙漠本身”的延伸,沙漠正无孔不入地突破人为屏障,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甚至渗透进人的血液里。与此同时,现代文明赖以联结的渠道被彻底截断。“我不可能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我的电话没有任何信号。”^[4]失效的手机信号象征着与人类社会网络、信息交流的分离,妮可处在一种原始的、绝对的隔绝境地。视觉维度上,荒漠“这里依然干燥荒芜,只有几处孤独的生活地点”^[4]。“依然”一词,暗示了这种荒芜并非暂时状态,而是一种持久的存在。“孤独”则进一步将物理上的隔绝感延伸至心理与存在层面,表明生存于此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孤独,更泄露了妮可的心理状态。一个内心丰盈、充满希望的人可能会用“单独”来形容生活地点,而妮可用了“孤独”,这直接暴露了她的内心体验。故这种外部环境的隔绝,并未止步于物理层面,更透露了妮可的内心感受。

它与女主角妮可当时所陷入的创作困境和婚姻危机形成了共振。正如沙漠是贫瘠的,身为作家的她也没有灵感,外部环境的贫瘠成为她内部创造力的隐喻^[5]。在创作上,她将写作比喻为“一艘沉没的船”,这种“沉没”喻示创作停滞的无尽头,与之前提到的无垠沙漠对应——两者都呈现出一种望不见尽头的状态。她无法从创作活动中获得精神突破,也无法在睡眠中得到身体与心理的恢复。“工作进展不顺,这让我经常感到焦虑”

以及“我一直睡不好”^[4],失眠在这里可视作其内心焦虑的外化,表明她正承受着精神压力与生理失调的双重煎熬。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彼此交织,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灵感缺失导致写作停滞,写作停滞致使工作无法推进,停工进一步加剧焦虑情绪,而焦虑情绪又破坏睡眠质量,睡眠的紊乱又削弱其灵感生成的能力。这种恶性循环将妮可困于一种持续内耗的心理与创作困境之中,她越是焦虑于灵感枯竭,就越陷入更深的枯竭,难以挣脱。妮可坦言“如果我的写作是一艘沉没的船,更广阔的背景……就是我失败的婚姻。”^[4]作为妻子,她也有着婚姻危机。结婚多年,此时两人皆“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我和丈夫之间渐行渐远”,而曾经的对彼此的感觉与爱意“不是已经枯竭,就是受到了遏制”^[4]。“枯竭”一词呼应了沙漠中水资源的匮乏,象征着这段婚姻丧失情感的滋养与活力。而“遏制”则暗示了封锁,如同沙漠中与其他人断开的联结,亲密关系中的表达被强行阻隔。更令人窒息的是“我们之间不允许发生冲突,更不用说愤怒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说出来……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无垠的孤独中”^[4]。无法言说的情感或痛苦,如同书中那褐色、苦涩的水流,在婚姻的管道中暗自流淌、缓慢腐坏,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却早已变质。这种强制性的沉默使她“回到了无垠的孤独中”,两者都指向一种隔绝且无法与外界建立有意义联结的境遇。这也解释了上面选择使用“孤独的生活地点”而非“僻静”“独立”或“单独”等中性词汇。因为“孤独”不仅描述了一种物理状态,更强烈地暗示了情感匮乏的心理真实,从而外化了妮可此刻被内外荒芜共同围困的精神困境。

此时,妮可承受着物理空间中的孤立、创作的停滞与婚姻的枯竭。它们共同作用,使沙漠呈现出一个规训的空间。规训的暴力在于它不需要高墙电网,而是在人的内心建立起挥之不去的规训场域。沙漠中狭小的房间与资源的匮乏规训着她的身体,限制其移动范围并控制其基本生存需求。创作上的枯竭与恶性循环规训着她的精神,使她陷入自我怀疑的煎熬之中。而婚姻中不允许冲突、不允许言说的常态,则规训着她的情感表达,压抑着真实感受的表达。而妮可此时也没有提过要离开沙漠、没有要放弃写作、没有想与丈夫离婚,外部沙漠的荒芜景象由此完成了向内部心理机制的转化,成为一个典型的福柯式规训场域。它并不直接施加暴力,而是通过环境、关系和自我的多重交织,使主体主动调适自身,最终自愿囚禁于这座牢笼之中,外部沙漠的荒芜,最终内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囚笼。但是,沙漠同时却又蕴含着解放的可能,这片剥离了文明喧嚣的土地,意外地成了她摆脱模仿状态的契机。沙漠剥夺了复杂的社会性刺激如他人的评价,发烧又使她无力进行复杂的逻辑思考。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强行关闭了她通常依赖的、经过社会文化“翻译”的认知模式,并且之前提到的创

作和婚姻问题也暂时被搁置，她开始在沙漠中内省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模仿别人的想法和行动。我做过或说过的那么多事都反映了自己周围人的一言一行。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我心中依然燃烧的生命微光很快就会熄灭……后来我开始慢慢地学会用别人的眼光看待一切，学会模仿别人的言行，并模仿他们的言行来塑造自己的人生^[4]。

文本揭示，妮可过去一直处于模仿周围人想法、言语和行为的状态之中，这或许是她获取安全感与认同感的方式。一直是“用别人的眼光看待一切、用他们的言行来塑造人生”的状态。模仿是社会化的结果，是逐渐被环境所规训的。模仿最终会导致自主性的缺失，此时自我被外部标准所定义，付出的代价是“心中依然燃烧的生命微光”即将熄灭。这里的“生命微光”是自主意识、创造力和真实自我的隐喻。那么妮可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她的写作一直建立在“模仿其他作家”的基础上，那她的作品将缺乏灵魂，因为创作的本质是独特的个人表达。此时，沙漠以其原始的荒芜，剥离了社会强加于身的物欲与模仿逻辑，所有曾经充斥于她生活中的社会刺激、他人目光骤然消失，她没有可模仿的对象，也没有可参照的言行，从而获得了摆脱模仿的可能。同时发烧的她需要主动去体验世界，当大脑无法处理复杂信息时，身体的求生本能会将所有能量集中于基础的感官，她的感知体系被彻底重建。听觉上，她能听到自然的声音“风声”，建筑的“屋子的膨胀收缩”、微弱生命的频率“苍蝇的拍打”、甚至将视觉转化为听觉上的低沉声响“阳光在地板上的嬉戏声”。此时，听觉不再为社交功能服务，她倾听的是世界本身细微的声音。痛觉上，疼痛的性质改变了。它依然存在，但被她转化为一种迫使她聚焦的方式。“当疼痛难忍时……我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视力在变得敏锐……我的视力犹如锋利的剃刀，不管盯着的是什么东西，都无处遁形。^[4]”这表明痛觉强行关闭了她所有的杂念，她的注意力只能被“强迫”停留在仅存的事物上，如墙上的污迹、窗上的斑点。在视觉上，“剃刀”的作用是分离。她直接看到微观、真实的物质细节，令其“无处遁形”。她分离了事物所有的文化标签与象征意义，直抵事物本身。这套感知改变的核心在于，通过剥夺复杂的社会性刺激，迫使感知回归最原始、最直接的状态，从而绕过了“他人眼光”的滤镜，让她不再是意义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以自身为主体，直接、独创地体验并确认自我与世界的真实存在。

此时妮可也越能感觉到自己的主体意识，中心转变为角色自己。就像她自己说的，“我直接观察世界上的事物，而不需要使它们服从于秩序。我只是以我自己生来就有的独创性看到了所有的事物，而不需要给它们赋予人的翻译。^[4]”“人的翻译”指的是社会文化赋予我

们的那套认知滤镜，也就是前文分析的“模仿逻辑”。比如，我们看到一朵玫瑰花，会立刻想到“爱情”“美丽”等文化标签，而不是纯粹感知它的颜色、形态、质感。妮可在沙漠中，摆脱了这层“翻译”。她不再将事物“服从于”预先存在的、人类中心的“秩序”。她看到的墙上的污迹就是其本身，而不是“脏了”或“需要清洁”的符号。这个过程将她的自我从被动的意义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创造者和感知主体。世界的意义不再由外部社会赋予，而是由她此刻最原始的、最直接的感官体验来定义。中心彻底从“向外求”转变为了“向内求”。这里沙漠不再是单纯荒芜的风景区，它变成一个强大的、主动的、甚至具有启迪力量的能动者。它用其严酷和纯粹，强行拆解了妮可身上的社会枷锁。与此同时，妮可也不再是被动承受痛苦的弱者。发烧和不适反而成了她激活内在潜能、重塑感知的催化剂。她从一个被社会规则定义的人，变成为一个“有自己独创性”去观察世界的、充满“主动性”和“价值”的主体。

故而这里有着对沙漠和女性自主性的承认。生态女性主义强调自然与女性之间的连结，自然并非被动客体，而是具有自身价值和主动性，同样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被动地去感受一切的客体，而是同样需要有自身价值和主动性。此时妮可与沙漠形成了一种同盟关系，共同对抗着那种将生命“工具化”和“客体化”的模仿逻辑。

2 对男性叙事中荒芜想象的解构

关于沙漠这一荒漠题材，男性作家建构了一套以征服和逃避沙漠为核心的叙事范式，而女性作家则通过细腻的自然观察，发展出强调适应与共生的生态书写。19世纪美国工业化时期，工业革命在美国北部率先开展，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速了西部开发^[6]。面对城镇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男性作家开始怀念乡村田园和原始荒野，这种社会心理催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观照方式，即征服和逃避^[7]。但在同样历史语境下，女性作家往往能发现被男性视角忽视的自然细节，在看似荒凉的环境中捕捉生命的律动，适应沙漠并与沙漠共生^[8]。在书中，克劳斯对沙漠生态的细致描绘，彻底解构了男性叙事中的荒芜想象，她笔下的沙漠是有着内在自足的生态系统。

房子的一侧是一张刻满小刀划痕的野餐桌，背面是一口盖着的石井。一定有地下水或地下蓄水层，因为房子周围还有许多灌木丛，还有三四颗带刺的小树。也许是西番莲或金合欢。不久，雨会到达这里，沙漠也会绿茵覆盖样……我看到了许多动物，它们的饮用水源肯定就在附近。山里有长角的野山羊，还有一小群羚羊来啃食灌木丛，还见过一只沙狐，长着琥珀色的毛皮，大而尖的耳朵，小而薄的鼻子，匆匆地跑过……也有许多

老鼠，它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4]

在妮可视角下，沙漠蕴含着丰富生命网络的自足生态系统，这片被男性作家视为荒芜的沙漠正悄然展现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在房屋背后那一口盖着的古井下，暗流涌动的地下水系如同沙漠跳动的脉搏，滋养着地表那些看似干枯却顽强生存的耐旱植物。文中提到的西番莲、金合欢，它们的生存既需要扎根于现有结构，又必须发展出自我保护机制。它们的存在证明，即使在最严苛的环境中，生命依然保持着自我组织、自我维持的主体性^[9]。除了植物外，沙漠中还栖息着许多动物。野山羊和小羚羊群作为初级消费者，通过选择性啃食特定灌木来调控植物群落的分布与生长，它们的觅食行为不仅满足自身需求，更促进了植被的更新迭代。同时，羚羊群体的存在证明这个系统具备持续繁衍的生命力。沙狐作为捕食者匆匆穿梭在沙漠中，捕食小型动物维持着生态平衡，防止任何物种过度繁殖。老鼠群体则在地下构筑起复杂的巢穴网络，它们既是分解者参与有机质循环，又为其他捕食者提供食物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所有生物都使用着地下水源，这个隐秘的水循环系统如同生命网的中枢神经，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不同营养级的生物通过捕食、竞争、共生等关系形成了精密的能量流动网络，每个物种都在主动参与并塑造着这个系统，而非被动适应。这种自我调节、自我维持的特性，以及代际延续的生命力，共同证明了这个沙漠生态系统是一个不依赖外界干预、能够自主维持平衡的自给自足的生命共同体。

与此同时，女作家眼中的沙漠生态系统展现了“自然的主体性”和“拒绝被客体化”的生态哲学意涵。自然主体性即每个生命体都具有独立于人类评价的内在价值。地下水系不受人类工程干预而自主循环，耐旱植物不因无人观赏就停止生长，动物不因人类缺席就改变社群法则。它们的存在价值根植于自身生命逻辑，而非人类的效用判断。整个沙漠生态系统展现出令人敬畏的自组织能力 and 内在价值，远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被动等待开发的“资源”，而是一个充满能动性和自主性的生命共同体。这些生命现象也表明了对客体化的拒绝。客体化指的是将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降格为被动客体的系统性暴力，它同时作用于自然与女性。当人类将自然简化为待开发的资源、将女性物化为可支配的他者时，沙漠中的每个生命都在用自身存在证明，真正的生命永远不能被降格为被动客体^[10]。当观察到沙狐、野山羊等动物在严酷环境中的生存时，妮可看到的不是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而是生命网络的相互扶持。因为书中每个物种的生存行为都在无意中为其他生命创造生存条件，比如沙狐的存在稳定的老鼠数量，而鼠群的存在又确保了沙狐幼崽的存活率。生命价值不在于孤立的强大，而在于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联结。这片沙漠生态系统，它证明生命价值从不依附于支配者的定义，也成为生态女性主

义思想的物质载体。那些沙漠植物恰如在社会中挣扎着向前的女性，动物们建立的复杂生存网络，则隐喻女性在社会中发展出的互助智慧和适应伦理。当沙漠中的每个生命都在自主决定其存在方式时，它们实际上为所有被压迫者指明了一条解放路径——不是通过乞求支配者的承认，而是通过向内求，坚持自身存在的完整性与创造性。

在男性荒漠叙事传统中，疾病往往与脆弱、失败、濒临死亡挂钩。疾病意味主体失去对环境和身体控制权，征服失败，故事结束^[11]。而女作家克罗斯笔下的妮可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因为女主妮可在发烧时认为自己精力充沛，觉得生病是健康的。在对感受的定义上，“相反，在生病中，有时候我感觉自己精力充沛。我想，我觉得比小时候更有活力。^[4]”具体来说，发烧导致的高体温加速了新陈代谢，“唤醒”了她的身体系统。这与前一段分析的感官变得极度敏锐直接相关，比如拥有剃刀般的视力，这种强烈的存在感，让她感觉“精力充沛”“比小时候更有活力”。在对痛苦的定义上，“这种痛苦、这种自我的剥皮或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发烧痛苦但不会造成伤害，是因为“剥皮”剥去的是她长期以来为融入社会而戴上的面具、模仿的言行、通过他人之眼看待世界的滤镜。因此，这种痛苦不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伤害的不是她的本质，恰恰相反，它是在清除伤害她本质的东西。她找到了被社会身份掩埋的、本真的自我^[12]。在对疾病的定义上，“因为我相信我的疾病——无论它是什么——也是一种健康的形式。^[4]”社会定义的“健康”，是一个能正常模仿、功能化运作的个体，但这在精神上可能是麻木的，是一种“病态”。而她当下的“疾病”，虽然生理上痛苦，但精神上是健康的，此时她能真实感受痛苦、并在此过程中找到自我，远比一个麻木地“正常运行”的社会成员更为健康。沙漠和疾病在女性视角下不再是需要击败的“敌人”，故事的冲突模式从“人与环境”转化为“旧我与新我”。因此，疾病的到来非但不是故事的终结，恰恰是新主角，即本真的妮可的新开始。疾病没有让她失去控制权，反而让她重新夺回了对自我感知和意识的主导权。正如沙漠生态系统拒绝被简化为荒芜的客体，发烧中的意识也拒绝被降格为单纯的病理现象，而是坚持其作为另类认知通道的主体性价值。在发烧最厉害的时候，妮可看到了一只头顶盘旋的鹰。

我一定是在发烧最厉害的时候走到了距离房子有半英里远的地方，压根不知道怎么到了那里。我望着天空中的一个黑点，以为那是一只头顶盘旋的鹰。它大声叫着，仿佛是我发出的叫声。我突然感到自己肺部后面正在紧绷的是快乐。^[4]

书中鹰是自由的化身，因为它不受大地束缚，这象征着妮可渴望摆脱的日常琐碎和模仿逻辑。鹰从高空俯

瞰,拥有最广阔的视野。这隐喻妮可在高烧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日常琐碎和痛苦的视角,她正在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只鹰大声叫着,她感觉那是自己的叫声。这是因为在生病状态下,她的自我意识不再局限于肉体,仿佛自己的灵魂已经出窍。鹰不再是一个“他者”,而是另一个层面的“我”,强调了她主动地代入^[13]。鹰替她喊出了挣扎、痛苦以及挣脱束缚的强烈渴望。肺部呼吸之源,紧绷通常意味着窒息、困难或病痛。在高烧中她肺部清晰的“紧绷感”反而无比强烈地提醒着她自己身体和意识的存在。这种感觉虽然不适,但却异常真实,让她清晰地感知到“我还在,我还活着,我正在强烈地感受着”,她并没有被动地忍受这种不适。相反,她主动地赋予这种感觉一个全新的、积极的意义。就像跑步时心跳加速、肌肉灼烧的感觉,那虽然是累的,但也是充满活力的,所以妮可说紧绷的是快乐。

反观男性作家笔下的鸟,以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为例,哈里男主在濒临死亡之际遇到秃鹫,死亡气息十分浓厚。开篇就提到天空中盘旋的大鸟,之后细节也暗示了是秃鹫,“别说傻话了,我眼看就要死了,问问那帮狗日的’他朝那些脏兮兮的鸟蹲着的地方望去,它们光秃秃的脑袋埋在耸起的羽毛里^[14]”。秃鹫在男性叙事中通常是恐惧和死亡的投射对象,这种认知根植于西方父权文化对自然的二元对立想象——将猛兽妖魔化为生命的掠夺者。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人与秃鹫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秃鹫是耐心的猎食者,哈里是将死的猎物。秃鹫在天空盘旋,他们之间是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哈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被观看”“被等待”的对象,这种关系强调了他的被动性和无力感。秃鹫的出现是为了宣告哈里生命的即将终结、梦想的破灭和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它标志着叙事正向一个不可避免的、向下的终点滑落,而此时哈里对死亡临近的感受也越来越明显。“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这个念头伴随着一股冲击而至,但这冲击既不像流水,也不像一阵风,那是一股带有恶臭的、突如其来的空虚感。”哈里跟妮可一样,身体都到了一定的极限,但是围绕在哈里脑海里的却是“空虚”。这是因为在面对死亡时,哈里其内心世界无法提供任何替代性的精神资源,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秃鹫盘旋,等待死亡的降临。他沦为一个被环境吞噬、被动等待的客体,生命自然就只剩下虚无。而妮可并非因外部环境而坠入虚无,而是通过摒弃社会模仿,转而向内求,从强大的内在汲取力量,最终完成了从被动承受者到主动创造者的蜕变。

所以,女作家笔下的鹰,消解了将自然他者化、妖魔化的二元对立想象。疾病不再是等待被外部力量影响的被动过程,而是主动向内探索、烧却社会伪装的契机。痛苦不再是意义的终结,而是感知锐化、生命力迸发的方式。而曾经被定义为“虚无”的极限境遇,也因

此被重新赋义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场域。在这里,个体得以摆脱一切外部定义,仅仅依靠本真自身,便能完成从客体到主体、从模仿到摆脱、从濒死到新生的飞跃。

3 沙漠交织的生态女性与犹太背景

除了生态与性别维度,克劳斯的犹太身份也不能视而不见,她选择以色列沙漠作为叙事空间绝非偶然的地理选择,而是蕴含着对边缘群体的深刻思考。沙漠代表着资源匮乏、被主流忽视、环境严酷,象征犹太人和女性等边缘群体的生存条件。犹太人素来也有沙漠里的仙人掌之称,沙漠暗示着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但仙人掌也强调犹太群体在艰苦环境中的顽强生命力^[15]。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长期处于文化和权力的边缘,她们的声音和主体性被忽视,也是边缘群体。

妮可在沙漠中的感知与觉醒,象征了女性在边缘地带爆发出的顽强生命力。书中妮可思考着如果抛开这两种身份,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站在沙漠里完全脱离了自己、脱离了旧秩序的犹太人,那将永远是不同的东西不是吗?^[4]”脱离自己指的是脱离自己的身份,不再是某某人的妻子或者母亲。“脱离了这个旧秩序”指的是挣脱了主流群体的规则体系,挣脱了他者来定义自我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是犹太人在非犹太主体民族社会中为了生存而形成的,基于流散经历,是绝大多数民族所没有的^[16]。大多数主体民族的自我认知是直接的,比如是美国人、法国人、中国人。这里的旧秩序意味着作为边缘群体,他们处在永远作为“客民”、永远作为被审视的“他者”的处境中。那么,当一个女人不再通过“与男性相关的身份”来看自己时,当一个犹太人不再通过“非犹太世界的目光”来看自己时,那将是不同的东西。不同是因为当“他者”的目光消失后,身份不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抽象问题,而是一种具体的、源自生命本身的体验,此时是实现其真本性的契机。这里暗含着对于所有边缘群体困境的解放路径,即真正的出路不是依然默认并受困于“他者”制定的规则,而是脱离那套规则,回归到生命最直接的体验中去,从“我”出发,重新定义“我是谁”。

沙漠是边缘群体获得解放的契机,但是只能是在沙漠中才能获得解放吗?书中妮可就指出了这一问题。“难道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真正成为犹太人吗?^[4]”在以色列,犹太人作为主体民族,个体确实能摆脱流散地的“旧秩序”,不再是“他者”。但是身份的解放并非简单地通过更改地理位置就能自动实现。以色列确实提供了外部条件,但内心的解放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即使这个人在以色列,如果内心仍未摆脱“他者目光”,依然用以前的思维模式来定义自己,那么他仍然是精神上的“流散者”。克劳斯在这里暗示着,以色列沙漠作为一个真实的物理环境,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个体有机会去练习一种不依赖于他者目光的、主

体性的存在方式^[17]。但是真正的自由并非依赖于现实中的极端环境,而是应该要有一种“向内求”的心态,个体能借自身体验、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女性群体和犹太群体都不应该逃避社会,不作为被动的“客体”被塑造,而是拥有稳定的“主体”内核,主动去参与和创造。

结合宗教史观来看,沙漠是犹太民族获得启示的关键场域。在《出埃及记》中,犹太人在西奈荒野漂泊40年,当时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默默忍受着物质匮乏的考验,但是在没有固定社会结构的荒野中,犹太人得以摆脱埃及的奴隶身份限制,逐步形成自治的部落联盟,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塑造民族认同^[18],沙漠成了一个神圣启示的空间。男性先知以利亚、摩西等都在沙漠中获得重要启示,这种宗教记忆深深烙印在犹太文化基因中。同样,《暗黑森林》中的沙漠描写延续了这一传统。书中的沙漠对女性来说也是充满启示之所,妮可跟《出埃及记》中的犹太群体一样,只能默默忍受着物质匮乏的考验,同时又塑造着自我认同。但是《出埃及记》中犹太群体的获得启示是通过男性先知的,妮可却不是,她进行的是一场“个人的出埃及记”。即她所要脱离的“埃及”,不仅是沙漠这一地点,更具体指向了犹太文化传统中对女性构成的特定角色期待,是从民族内部性别结构中的自我放逐。因为在《圣经》故事里,从摩西到以利亚,接受神启的总是男性领袖,而女性要么如米利暗般被边缘化,要么像夏甲那样成为被动承受者。而《暗黑森林》里的妮可得到启示不是通过男性先知,而是通过普通女性的主动体验,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平民化、女性化的启示模式,故启示不再专属于男性,女性也可以通过与自然互动中获得启示,克劳斯在这里暗含着将主体性垄断于特定男性的反抗,承认女性的认知能力。

犹太民族的流散经历虽然充满艰辛,但在宗教文本中却被赋予神圣目的与集体被救赎的结局,《出埃及记》中的沙漠漂泊最终导向应许之地,带有终极目标,并被叙述为通往救赎的必经之路。而妮可所代表的女性群体则缺乏这种“救赎脚本”。女性的沙漠漂泊并没有导向“应许之地”,因为书中的妮可的行动是自主的、自发的,她不依赖于任何外部许诺的“福地”,也非等待某种神圣力量的拯救。此外,虽然犹太群体和女性都是边缘群体,犹太人的边缘性通过以色列建国和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而对于缺乏历史性救赎脚本的女性群体而言,女性身份在职场、家庭及社会期待中,仍常是需要额外克服的障碍,而现实生活中女性与男性的不对等仍在全球范围内延续,这种不对等渗透于日常细节。克劳斯所描绘的这种不依托于宏大历史叙事、转而向内求的选择,对于缺乏“救赎脚本”的女性群体而言,显得尤为珍贵和有力。它提供了另一种破局方法,即每一个个体都需要有“向内求”的勇气,解放

不再是等待被一个集体命运引领至某个许诺的终点,也不是等待神的救赎,而是依靠自身力量,在困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克劳斯将妮可的犹太身份与女性身份交织,两者有共同之处,比如都暗示了边缘群体的困境,但解构了传统犹太叙事中沙漠作为“男性先知领受神启、通往应许之地”的集体救赎范式,转而让一位普通女性不依赖外部赐福、不寄托宏大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犹太沙漠不是地域局限,恰恰相反,它是对其深厚文化意涵的运用,借此表明,真正的启示永远始于个体向内求索、并敢于亲手从自身苦难中开创意义。

4 结语

在《暗黑森林》中,沙漠是一个物理隔绝和规训的场所,但也存在解放的可能,是妮可重新发现自我主体性的关键场域。同时,作品通过解构男性叙事中的荒芜想象,赋予沙漠以丰富的生命网络和自然主体性,将自然与女性相连接。揭示了女性如何在看似荒芜的环境中寻找内在力量,在压迫性环境中发展出独特的韧性,并通过互助与适应实现自我价值。此外,基于作家的犹太身份背景,作品将民族历史与女性经验相结合,为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提供了隐喻性解读。妮可在沙漠中的觉醒过程,并非对现实的妥协,而是基于内在觉醒后的自主抉择,呼应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主张,即真正的解放不在于逃离社会,而在于打破权力结构,重塑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社群的关系。

在生态危机与性别不平等依然严峻的今天,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审视沙漠意象,有助于理解女性从自然中汲取智慧,拒绝被动客体化,同时以批判性思维重新审视文化传统与社会角色,从而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寻找平衡与解放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Plumwood, Val.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15-18.
- [2] 方堃. 薇尔·普鲁姆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评析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1.
- [3] 郭晓芬. 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 [4] 妮可·克劳斯. 暗黑森林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39-245.
- [5]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 [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77-80.
- [6] 胡志红. 西方生态批评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12-115.
- [7] Buell, Lawrence.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 American Cultur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8] 方荣. 女性自然文学传统下玛丽·奥斯汀的荒漠书写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 [9] Glotfelty, Cheryll, Fromm, et al.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G].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56-60.
- [10] Gaard, Greta. *Ecofeminism Revisited: Rejecting Essentialism and Re-Placing Species in a Material Feminist Environmentalism* [J]. *Feminist Formations*, 2011, 23 (2): 26-53.
- [11] 袁杰. 走向消失的存在: 现象学与德里罗的荒漠书写 [J]. *外国文学*, 2020 (2): 66-77.
- [12] Warren, Karen J.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88-92.
- [13] 于文秀. 超越平等与差异: 重塑理性与自我——评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 [J]. *文艺研究*, 2017 (1): 152-160.
- [14] 海明威. 乞力马扎罗的雪 [M] //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14.
- [15] 徐向群. 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33-35.
- [16] 敬南菲. 出路, 还是幻象: 从《应许之地》《店员》《美国牧歌》看犹太人的美国梦寻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 [17] 敬南菲. 谁的巴勒斯坦: 《不速之客》的空间与记忆书写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45 (5): 36-44, 160.
- [18] 高天琪. 《出埃及记》中的耶和華形象与犹太民族身份建构 [J]. *以色列研究*, 2021 (00): 82-94.

The Desert Imagery in *Forest Dark* From an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Song Ping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Hangzhou

Abstract: The desert in *Forest Dark*, a novel written by Nicole Krauss embodies multifaceted symbolism. To begin with, the desert is a desolate real-world environment, which unexpectedly provides Nicole with an opportunity to break free from imitation and attain autonomy. Furthermore, it deconstructs the barren conception of the desert perpetuated by male narratives, revealing instead the inherent ecosystem within the desert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Nature, thereby establishing a metaph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Women. Moreover,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desert narratives within Jewish culture, the novel highlights the divergence between national redemptive narratives and the individual plight of women, emphasizing how women achieve self-awakening through inward exploration. The desert thus becomes a central metaphor linking nature and femininity, providing new interpretive spa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lemmas faced by women in modern lif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subjectivity.

Key words: Nicole Krauss; *Forest Dark*; Ecofeminism; Desert